

对英国来说，如此行事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——当时其还控制着香港地区。其希望中国的政权更迭不会影响到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。从大历史的角度，新中国当然要促使香港回归。然而，在新中国建政之初，并没有将香港回归问题摆在最优先解决的事务实行。百废待兴的新中国，率先追求的是国家的大致统一，以及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，中英本可循序渐进地发展关系。

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，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势头中断。之后，英国在朝鲜问题、台湾问题和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，使得中英外交关系长期停留在代办级。与英国不同的是，诸如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、瑞士等欧洲国家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初承认了新中国，并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。

法国的情况又有不同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法国政府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。原因在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如火如荼，而新中国是坚决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争的。当时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本身也政局动荡。在法兰西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英雄戴高乐将军被迫下野，且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以后，法国政局愈加混乱，内阁如走马灯似的更换。直到戴高乐东山再起——1958年9月28日，法国公民投票批准了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草案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诞生。

曾在1952年、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·富尔此际全力支持戴高乐复出。戴高乐肯定知道富尔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。原因在于富尔担任总理期间，就曾研究中法建交问题，但一直没有时间解决。富尔为法国迈出的第一步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，也让新中国在法国设立新闻处。

卸任总理后，富尔曾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，于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前往中国，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度的“私人旅行”。时年53岁的富尔称，因为中法没有外交关系，自己“或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界人士”。归国后，富尔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，“法国没有奉行‘两个中国’政策的理由”。法国读者还了解到，富尔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。他在华旅行期间，曾到访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，感触极为深刻，以至于归国后写作出版的有关他观察新中国的著作，取名“龟蛇”（Le serpent et la tortue）。书中，他不仅巧妙借用毛泽东词作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中“龟蛇锁大江”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之句，更希望中法关系能似武汉长江两岸的龟山、蛇山一般，得以跨越山海连通起来，



亦即建交。

读到富尔寄赠《龟蛇》一书的戴高乐，回信表示，与中国建交是很有意义之事。然而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戴高乐，要急忙解决的问题很多——非洲等地法属殖民地的独立问题要妥善解决，其中包括令人头疼的阿尔及利亚战争；循着第四共和国时期签署的罗马条约承诺，加入欧共体并发行新法郎亦是急事；更有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为全民投票云云。直到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，令戴高乐乃至整个法国都感觉到必须加快去做些什么了！

美苏两个超级大国，一个在意大利与土耳其，一个在古巴，